

明清话本小说中的善恶报应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杨宗红

(广西贺州学院中文系, 广西 贺州 542800)

提 要: 明清话本小说中广泛的善恶报应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 深刻挖掘善恶报应所体现的和谐精神, 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话本小说; 善恶报应; 和谐精神; 和谐社会

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志码:** A

胡锦涛指出: “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①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深刻挖掘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建立和谐社会因素的内容。明清话本小说作为雅俗共赏的文学样式, 善恶报应是其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善恶报应所倡导的许多道德准则属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 如孝顺父母、宽仁忠厚、诚实守信、重义轻利、去恶行善、慈悲利他、知恩图报等伦理观, 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应充分发挥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独特作用。

一、话本小说中善恶报应所体现的和谐精神

“从明至清, 我们历数影响较大的话本小说集, ……可以说没有一部没有“因果报应”的说教”^②, 综观明清话本小说中善恶报应故事或说教, 可以发现, 善恶报应的精神亦体现在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上, 其所倡导的和谐精神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人与自我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1) 人与自我的和谐

和谐社会的构建首先是人自身和谐的构建。《孟子·尽心下》有“君子之守, 修其身而天下平”之论, 《论语·宪问》亦有“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天下”之说。自我的不和谐导致个人出现行为偏差, 从而影响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上述话语还揭示出了自我和谐必由之路: 修身。只有修身, 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礼记·大学》言: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此话道出了修身作为人之为人之重要以及修身的基本方法, 即正心诚意。所谓“正心”, 即摒弃私利, 不以自我为中心; 所谓“诚意”, 简言之, 对得起自己的心。人自我不和谐乃在于人心不正, 以自己为中心, 私欲澎湃, 意不诚则无廉耻、宽恕、仁爱之心。

明清话本小说竭力彰示人之“心”所导致的不同的行为以及不同的报应。心之所至, 意之所至, 心有善念乃行善, 心有恶念乃行恶。行善得善, 行恶得恶。《初刻拍案惊奇》(下称《初刻》)卷二一正话中的郑兴儿命不好, “妨主”被赶, 于厕中拾银若干, 开始想到“造化! 造化! 人有此银子, 不忧贫了。”又想一想, 道: “我命本该穷苦, 投靠了人家, 尚且道是相法妨碍家主, 平白无事赶了出来, 怎得有福气受用这些物事? 此必有人家干甚紧事, 带了来用, 因为登东厕, 挂在壁间失下了的, 未

必不关着几条性命。我拿了去，虽无人知道，却不做了阴鹭事体？毕竟等人来寻，还他为是。”当他把银子还给失主后，命运一步一步改变，后官至游击将军，子孙也得世荫。《醒世恒言》卷十八施复、《警世通言》卷五中（下称《恒言》、《通言》），吕玉拾得银子时都推己及人，将钱还与失主。不是免灾，家事兴旺，得了意外之银若干，就是得遇失散之子，得救落水的兄弟，一家骨肉团圆。《二刻拍案惊奇》（下称《二刻》）卷二四，元自实起杀人之心，鬼便跟着他；推己及人，改了杀人之心，便有福神跟随。《喻世明言》（下称《明言》）卷十三，赵升辱骂不去，见色不动心，见金不取、偿绢不吝，被诬不辩，收留病乞、舍命从师，后随张道陵成仙。

反之，心中有恶念，就有恶行，当受恶报。《通言》卷五头回金钟见其妻老是向一寺施舍，心中恼恨，思以砒霜毒之，谁知阴差阳错，毒死自己亲子，妻因此自缢，他自己病死。同书卷二五桂迁受施济之恩，言当犬马相报，后在施济的桑园挖到金银两千余两，他担心还银时受施济敲诈，乃设计将银运到他乡当起了大户，后又赖帐不还。因忘恩负义，妻、子变狗。罗隐四处借钱不着，听说自己有半朝帝王之相而言有仇报仇，有冤报冤，被紫府真人换成贱骨（《西湖二集》卷十五，下称《二集》）。

心不正，意不诚则会以自我为中心，喜怒哀乐以己之所有，己之所需、己之所得为转移。高才生因傲才而化虎（《醉醒石》卷六）；老和尚修行多年，悭吝一钵盂，死后变蛇（《二集》郑七）；殷氏家累世奉道，积有阴果，但怒气太重，不得吕洞宾之度（《恒言》卷二一）；莫豪多才，作诗讥讽残疾人，目盲（《八洞天》卷三）。

观上述报应之事可以发现，善恶之报，多在人的一念之间。“一念之恶，凶鬼便至；一念之善，福神便临。如影随行，一毫不爽。暗室之内，造次之间，万不可萌一毫恶念，造罪损德”（《二刻》卷二四），大凡“心正”者，则内不违己，外不损人如此，则能见利思义，见贤思德、“己所不欲，毋施于人”，不贪、不淫、不吝、不争、不怒；反之，心不正，则有所爱，有所偏，如此，则恃才傲物、多怒，多妒、多贪、多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行事多乖。孟子言“知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修身则能知其心，心制约着性，人能尽其心，则能尽其性（仁、义、礼、信等）。“尽心”、“知心”则思行善。小说强调“心”在报应中的作用，无疑是促使人们修身正心，为善去恶。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荀子说：“人之生，不能无群。”（《荀子·富国》）严复说：“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天演论·制私》案语）人是群体之人，群体的存在与发展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要求人们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这种规范适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正是因为社会的规范因素，使得实际社会总体上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而不是战争状态”^③。

在社会结构系统中，家庭是最基本的单位，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不爱其亲者不能爱他，不义于其夫（妇）者不义于他，不友于其兄弟者不友于他。在长幼关系上，为父（母）者慈，为子者孝。父母不慈，则会杀子。吉孝不被继母所爱，被亲父勒死（《人中画》卷五）；李玉英继母为亲子，百般凌虐、残杀前妻子女，后“天理昭彰”，受国法而死（《恒言》卷二七）。“孝悌”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家庭道德

与行为规范。士有百行，孝为首。“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也莫恶于不孝。杭童不孝遭雷击（《警悟钟》卷三）；桃花欲毒婆母而变狗（《十二笑》第六回）。“元来那‘夫妻’二字，极是郑重，极宜斟酌，报应极是昭彰，世不决不可戏而不戏，胡乱作为”（《初刻》卷二十）。作为人伦之始，夫妇之间的和谐尤其重要，夫妻之间尤其要义。满少卿饥附饱扬，被鬼妻焦文姬魂魄所追而亡（《二刻》卷一一）；韩思厚背信弃义，被鬼妻报复，落水而死（《明言》卷二四）；李甲负十娘，郁抑成狂，终身不痊（《通言》卷三二）。兄弟之间的友爱也是家庭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话本小说中有不少是劝兄弟和睦相处，相互友爱的。张孝基设计将败家的舅子变作好人，并将岳父交与的家产全部给予他，后为嵩山之仙（《恒言》卷十七）。陈祈恐三个兄弟长成分家事，欺心将好田地典与毛烈，惹起一场是非，又害起心痛病，终不得脱。到后来，家计反不如三兄弟（《二刻》卷一六）。倪善继以嫡兄欺庶母幼弟，欲独占家产。其两子都好游荡，家业耗费，在父亲死后，竟将大宅都卖与小叔，人以为是“天报”（《明言》卷十）。

人与社会的和谐包括个人与他人的和谐以及个人与群体的和谐。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由于利益等原因，会与他人发生摩擦与冲突，由此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但社会有社会的行为规范与法则，话本小说为人们展示了遵守与违背社会行为规范所得到的不同的“果”。

《型世言》卷三一中，徐晞帮人大忙，又拒绝了送上门的财与色，位登二品；同书卷一九中，家贫、处馆为生的林森甫因助一被逼债而欲跳井之人，因此得一风水宝地以葬其父母，不久，取了科举，做了高官；李清治病救人，后升仙（《恒言》卷三八）。在物质利益面前，许多人“己”字当先，故拾金不昧之行被称道，善报亦快。如前面所言吕大郎还金完骨肉，郑兴还金得官做，施复还金得横财，又如裴度命当饿死，后因还带，得登相位（《明言》卷九头回）。这些受好报者在处理社会关系中，淡化自己，强化他人，故他们不贪不取，存心济物。天地之中人为贵，过分强调自己，淡化他人，则至于杀人越货，此种报应也更甚。《型世言》卷三三、《石点头》卷六、《初刻》卷三〇等都讲述了杀人者的恶报。

国家官吏的行为给民众造成的影响比一般个体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更大，更广，也更严重。社会学认为，行动者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角色是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单位，人们如果不按照自己所处地位的角色期待去做，此种行为的偏差极可能造成社会结构的解体。作为调节社会行为关系的国家机关的官吏，起着维护社会公理、公正，对抗社会的败坏的作用。他们尤其要选贤任德，自控自律，这是社会赋予的职责，也是民众对他们的期盼。“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通言》卷一五），为官者更应敬其事而慎其行。《二集》卷四中的赵雄做官之后，“并不做一毫伤天理，害人命之事，做人谦和，不贪赃私，在蜀五年，不知做了多少方便的事”。渐渐做官到宰相，做宰相后，“因见自己学问不济，极肯荐举人才，十二年之内，荐拔士类，不计其数，都为显宦”，故每每行事，定有神仙护佑。同书卷二九头回中，吴堪秉性忠直，一毫不肯苟且，做了本县一个吏员，一味小心，再不做那欺心瞒昧之事，不肯趁那枉法的钱财并立心不改，一味至诚老实。后吴堪娶仙妻并与之升天而去。《醉

醒石》卷一中，姚君治狱多行善事，上帝增其寿考，年九十，死，又命其为司命真君，兼泰山刑曹，子孙世世显贵。

由于官吏所处的特殊地位，其失范行为会导致社会整体行为失范，成为破坏和谐的最危险因素，因此，民众对于吏治失范行为尤其关切。“至于刑狱一事，关系尤重。存心平恕，则死者可生；用意刻深，则生者立死”（《醉醒石》卷一），所以，贪酷之官必无好报，糊涂之官也无好报。魏推官本该位至冢宰，因得人六百元，捉生替死，“不得抚楚”，并死于此事（同前，卷一一）；吾爱陶贪酷罢官，死后棺材因无人葬而风化，其女沦为烟花，子为犯案问成徒罪，遂死于路途（《石点头》卷八）。为官除了廉，还须明，清官断案亦要谨慎。李判官很清廉，“只是不肯要百姓的钱”，可是断案却有些糊涂，被城隍神惩罚，受了许多一个多月的刑狱之苦（《二刻醒世恒言》卷八）。

敬其事、慎其行则尽心尽力，不为一己之私而违法乱纪，违背社会公理。这样，则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能“有法必依”，且能“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所以，善恶报应思想影响于社会，不仅限于社会生活方面，对于各种体制的完善和政治生活的人本化也有着极大的支配作用。

明清话本小说披露的个体行为合符社会规范或失范后所遭受的果报无不揭示这样一个道理：在私欲与公利，个人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人们应当“克己”，前者服从于后者。当前者服从于后者时，矛盾冲突便消解了，善报也接踵而至。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生态环境的好坏与人类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古人主张与自然和睦相处，应天而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文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界万物共生共存，统一存在，反对人类为自身利益而过度戕伐自然。

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告子上》），朱熹释：“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用之有节。”真正具有仁爱之心的人常会推人及物，爱人亦爱自然。“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人并不是宇宙的唯一，人类与其它生物是和谐并生的，是平等的关系。话本小说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自然，既要“制天命而用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要敬畏自然。自然在人类面前，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受人类支配者，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类的行为。敬畏自然，则自然赐人以福；践踏自然，破坏自然，则自然赐人以祸。李公子救蛇，官至尚书（《明言》卷三四）；杨廉夫救金鲤，死为蓬莱都水监（《二集》卷二三）；勤自励因救一陷于槛阱中的虎，虎使其夫妻团圆（《恒言》卷五）。“天地之大德曰生”，杀生、伤生遭果报母题在话本小说中很多。计押番妻杀金鳗，全家死尽（《通言》卷二〇）。王臣伤狐获书，家败（《恒言》卷六）。“蠢动含灵俱一性，化胎湿卵命相关。得人济物休忘却，雀也知因报玉环”（同前），“众生皆是命，畏死有同心”（《初刻》卷三七），动物如此，植物也如

此。崔玄微救众花仙，花仙教之服花英，后成仙而去。秋先爱花，惜花、护花，当遇到危难，花仙救之，后秋先成仙为护花使者，专管人间百花；另一恶棍推残花，受到恶报（《恒言》卷四）。吴堪能娶仙女为妻，能成仙，就与他爱惜荆溪之水有关（《二集》卷二九头回）。话本小说中的精怪故事同样说明众生有命，众生有性，它们与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贪生畏死。当它们受到人类杀戮，当自然受到人类破坏，它们便要报复人类。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让自然仍旧保持其神性的一面，让杀生有报的信仰仍旧存在，让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同时存在，则人与自然自能和谐相处——这便是话本小说救生有报与杀生有报所彰示的道理。

二、用话本小说的善恶报应来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利因素

陶祐曾在《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一文中写到：“举凡宙合之事理，有为人群所未悉者，庄言以示之，不如微言以告之；微言以告之，不如婉言以明之；婉言以明之，不如妙譬以喻之；妙譬以喻之，不如幻境以悦之：而来自小说大家，皆具此能力者也。”^④公奴在《金陵读书记》中亦言：“以小说开民智，巧术也，奇功也，要其笔墨决不同寻常。常法以庄，小说以谐；常法以正，小说以奇；常法以直，小说以曲；常法正襟危坐，直指是非，小说则变幻百出，令人得言外之意；常法如严父明师之训，小说则如密友贤妻之劝。”^⑤一般而言，小说中都含有道德因素，它对人有潜移默化之用。所以，我们所阅读的小说影响我们对待别人的行为，也影响我们自己的行为模式^⑥。

相对于其它样式的文学作品而言，话本小说更利于教化世人。

其一是话本小说的“小”。话本小说大多在一至六回之间，读者所花时不多而获得多个完整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获得对生活的认知以及审美满足。对于那种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以劳动为生计的广大民众来说，这是中篇小说无法比拟的。其二是话本小说的特殊形式。许多话本小说有入话诗，得胜头回，中间有小说家的叙事干预，结尾还有以诗为证。“从某种程度上讲，作者的态度甚至比人物的态度还要重要，因为作者的声音天然地具有一种权威性，具有一种能令读者乐意倾听并信服的力量”^⑦。其三是话本的“话”字特点。“话本”本是说话人的底本，一则语言浅显，二则取材于民间，记载的是他们所熟悉的感兴趣的生活。话本小说的通俗性决定了它影响民众的广度。

当然，在今天来看，善恶报应有其局限性。但是，应当看到，话本小说中的报应多是一种框架，剥离这个框架，小说本身仍有教育意义。当今世界是知识经济世界，但其中所涌现的许多社会问题不是单靠科学技术所能解决的，换言之，诸多社会问题出现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宗教信仰问题。“释道……其祸福因果之说，用以悚动下愚，亦较儒家为易人。使回心向善，于世不为无补。”^⑧“善恶报应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道德规范，与世界任何一个宗教相比，这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实际上是我国古代社会的道德载体或道德万花筒”^⑨，“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社会，应当是一个德福统一的社会”^⑩。所以，如果对小说中的报应加以挖掘、整理与引导，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作用。

注释及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②刘兴汉:《“因果报应”观念与中国话本小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5)

③T.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P530

④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P227

⑤王钟陵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小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P8

⑥英)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P244

⑦李建军:《论小说修辞的道德效果》,《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P69

⑧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P340

⑨刘道超:《中国善恶报应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P147

⑩魏长领:《因果报与道德信仰——简评宗教作为道德的保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2)

On the structure of harmonious society by in Ming Qing Huaben stories

Yang zonghong

(Chinese Department, Hezhou University, Hezhou, 542800)

Abstract: There are abundant of harmonious thoughts in karma in Ming Qing Huaben stories. Deep excavation the spirit of karma ,It will have postive effect on the structure of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huaben stories in Ming Qing dynasty; karma; harmonious spirit ; harmonious society ;

作者简介

杨宗红(1969——)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广西贺州学院中文系教师,博士,从事古代文学文化研究。